

TOWARDS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E INNOVATION OF COMMUNITY-BASED SOCIAL GOVERNANCE IN NINGBO



走向协同治理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宁波探索

燕继荣 ▶ 主编

 人民出版社

ALTERNATIVE GOVERNANCE
GRASSROOTS SOCIAL GOVERNANCE IN NINGBO

走向协同治理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宁波探索

燕继荣 ▶ 主编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毕于慧
封面设计:王欢欢
版式设计:于丽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向协同治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宁波探索/燕继荣 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8

ISBN 978-7-01-017691-8

I. ①走… II. ①燕… III. ①社会管理-研究-宁波 IV. ①D67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85858 号

走向协同治理

ZOU XIANG XIETONG ZHILI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宁波探索

燕继荣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东方(北京)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9

字数:305 千字

ISBN 978-7-01-017691-8 定价:5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总 序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逐步凸显,因此,推进政府职能全面转变,实现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构建社会建设的新格局,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指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逐步成为国家发展和治理的重要战略,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而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决定》阐述的重要内容。全会明确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的战略任务。

此后,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指导,立足于我国深化改革的实践,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格局中,积极探索、深化构建和有效运行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发展社会治理实践,取得了积极进展,积累了丰富经验。

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都表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深入建构和有效运行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格局和体制,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良性互动,是深化改革,有效促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路径。而进一步深入分析研究这一路径的内在机理,总结典型经验,制定深化策略,提炼一般要素,阐明社会治理发展规律,则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任务。

正是本着这一宗旨,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北京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

新中心决定与部分地方政府密切合作,以近年来这些地方的社会治理实践为经验基础和典型样本,展开经验分析、理论提炼和机制研究,以析淀我国社会治理的地方经验与可复制的一般机理和做法。本书即是研究院及中心与宁波市合作的初步成果。

本书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社会的理论逻辑和生动实践,深入阐发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础理论,包括我国社会治理提出的背景、社会治理的基本内涵、构成、特征以及有效实施和提高能力的机制、方法与路径。

本书坚持问题导向,把社会治理现代化设定为一个综合性系统,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问题:谁来治理、治理什么、如何治理、以什么来治理。

关于“谁来治理”,主要讨论的是社会治理主体问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管理主要由公共权力主体单独承担,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体格局和创新体制的着眼点在于,在党委领导下,由政府负责,同时,以有效的机制设计,促进和包含社会组织、公民等多方主体有序参与。由此可见,现代化取向上的社会治理,是一元主导、多方参与、各司其职的协同治理。

关于“治理什么”,主要回答的是社会治理对象问题。“治理什么”是社会治理运行中较为复杂的问题。其之所以复杂,因为社会这一概念具有复杂性,其内涵和外延相对难以界定;另一方面,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甚至不同地区,社会治理的重点也不一样。研究表明,不同地区应该根据各自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根据不同时期各自面临的突出社会矛盾冲突和任务要求,确定不同的社会治理的重点对象。

关于“如何治理”,主要是指社会治理主体采取什么样的机制和方式来治理社会。显然,“如何治理”的问题具有工具理性价值,也就是人们常常说的渡河的“舟”与“桥”的问题。社会治理现代化,不仅是目标和战略的现代化,而且是社会治理机制和方式的现代化。深化改革和创新社会治理,实现社会善治的过程,既有目标理性,即实现社会公共之善,又有工具理性,即善于选择合适机制和方式达成治理目标。当前,尤其需要积极探索和创新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治理方式,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按照中央的部署,创新社会治理机制和方式,需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推进社会治理

社会化、专业化、法治化、精细化、信息化、智能化。

关于“以什么来治理”的问题,主要是指通过社会治理的系统整合和协同建构,实现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合作互动和协同连接,促进不同社会治理主体、机制和方式之间的有效链接整合。经验表明,社会治理的系统整合和基础,应该考虑建立健全三种机制:主体权责机制、协同联动机制和成果共享机制。

本书采用典型案例分析方法,试图从点到面、从典型到一般,为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发乎本土、内含规律、具有普遍性和可复制性的社会治理理论、机制和实践做法。为此,本书努力深入剖析浙江省宁波市的社会治理创新案例,系统梳理宁波社会治理的发展脉络,并从治理主体、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等方面系统总结了宁波经验,阐述了其一般普遍意义。

在治理主体方面,宁波市委多年一直致力于积极强化领导、改革创新政府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培育和包容多个治理主体的包容性发展路径。宁波市委首先积极加强基层党组织和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领导性、主导性、负责性地位和功能,促进基层政府职能全面正确转变,积极推进政府“放管服”的深化发展,并且把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下沉到基层、落实在基层。与此同时,宁波市委亦高度注重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运用公益创投等多种机制,鼓励、支持和培育社会组织的发展,促进社会治理新的格局的形成和完善。宁波市社会治理的实践,阐释了中国特色的“强政府—强社会”的社会治理模式,为此,本书研究指出,“中国的社会治理并非以削弱党和政府原有的强大自主性与资源动员能力为前提,而是在坚持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坚持以政府为主导的原则和策略下,以‘强政府—强社会’为最优目标模式。”

在治理体系方面,书中着力研究和分析了宁波市的主体权责体系。宁波市通过体制调整和优化,超越“各自为政”的原有行政分割管理体系,使得社会治理结构逐步趋向扁平化、网络化和协同化,确保社会治理及时发现、报告和处置问题,多方面多渠道及时顺畅沟通,达成责任党组织、责任政府部门、责任社会组织 and 责任公民的联动运行。就其治理功能而言,经验表明,这种机制可以有效地巩固社会秩序,维护政治稳定,化解社会矛盾,调动各方积极性、创

造性,合作共治,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需求。

在治理方式方面,书中集中关注的是宁波市协同联动机制的构建。本书以活生生的一手资料,生动形象地描述和显示了宁波市委市政府和人民在社会治理协同联动机制和方式方面的创新实践,分析指出宁波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之处集中体现为:宁波市委市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坚持正确领导,积极负责,坚持民主治理、协商治理、依法治理、有效治理,努力运用社会力量、市场力量和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以社会治理机制和方式的合作与协同,达成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同,进而深入构建和深化发展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总体格局,使得这种格局通过机制治理达成治理实效。

就其本质而言,社会治理的协同联动机制,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政府的履职、社会治理多方主体和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在根本利益上具有高度一致性和共同性。

宁波的社会治理经验具有一定的引领性。宁波市的社会治理创新,对党委、政府、社会、公众各治理主体间的组织协同、机制协同、信息协同、工作协同做出制度性安排,实现社会治理的问题发现机制、矛盾解决机制和服务保障机制的有序统合,推进社会治理的精细化、高效化,可以视为新时期“枫桥经验”的2.0版。

宁波的实践不仅具有典型效用性,而且其内含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的规律性,具有普遍的推广价值。课题组研究所知、所悟和所得,对于进一步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治理模式的本质和特征,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联系,对于进一步深化和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及其相关学术研究和实践,都具有难得的启发价值。

本书是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北京大学国家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与地方政府合作开展社会治理创新研究系列成果的第一部,其他研究成果,将陆续出版。

王浦劬

2017年5月2日

序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将原先的“社会管理”改为“社会治理”。许多专家学者对此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这不是简单的文字变动，而是重大的理念转变。我也是社会治理的积极倡导者之一，并且系统地论述过“国家统治”与“国家治理”、“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的区别。然而，至今还有不少地方官员和基层民众，依然认为中央文件从“社会管理”变为“社会治理”，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体制机制变化，有些改变即使没有新的“社会治理”理念，也同样会发生。以至于在一些基层干部群众看来，“社会管理”变“社会治理”只是文字游戏。为什么如此？我认为主要原因是我们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方面还没有很好地破题，没有建立起相应的体制机制，也没有及时出台相应的公共政策。

破解社会治理这一新的课题，要从多个方面着手，如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方式等，而且由于中国地方的多样性，各地社会治理创新的途径和方法也会有所不同。但是，要完成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转变，都要处理好三个方面的关系，或者从三个方面来破解这一新课题。一是治理主体的一元与多元的关系，即社会治理不应是党政权力部门一个主体，而应当形成党政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多元治理的格局；二是政府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的关系，即政府既要担负起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责任，也要担负起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责任；三是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关系，即社会治理并不只是政府对社会事务的治理，还必须有社会自治。

近些年来，从全国各地的社会治理改革实践来看，在公共服务、社会共治和社会自治这三个方面都有不少创新。从我们连续举办 15 年共八届的“中

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和6年共三届的“中国社会创新奖”的3000多个案例来看,相对来说,在公共服务方面的突破性改革最多,在社会共治和社会自治方面的突破性改革则相对较少。然而,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共治和社会自治。社会共治,就是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 and 社区组织的协同治理,这是现代社会善治的前提。善治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生活的共同治理,是社会治理的最佳状态。社会自治则是社会民主的实质性内容,也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完全可以说,没有高度发达的社会共治和社会自治,就难有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更难有作为理想状态的社会善治。

在社会治理的改革创新方面,宁波一直在进行着积极的探索,有些还走在全国前列,尤其是在社会共治、社区服务、居家养老和权力清单等方面的改革创新,其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走向协同治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宁波探索》,是我院燕继荣教授率领的团队的研究成果,对宁波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方面的经验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理论总结。作者用“协同治理”来概括“宁波经验”的主要特征,认为宁波市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坚持民主治理、协商治理、依法治理,充分运用社会力量、市场力量和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较好地实现了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协同和社会治理方式的整合。这一概括,抓住了宁波社会治理创新的关键,对于其他地方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俞可平

2017年5月3日

于京郊方圆阁

目 录

序	俞可平 1
导 论	1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任务	2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12
三、宁波经验的典型意义	18
第一章 政府管理的困境	20
第一节 全球化的管理难题	20
第二节 双重现代化的挑战	23
第三节 转型社会的压力	29
第四节 基层社会的矛盾	38
第二章 社会治理的逻辑	46
第一节 社会治理的含义、任务和本质	46
第二节 社会治理的目标和价值	53
第三节 社会治理系统构建及创新路径	55
第三章 探索过程:宁波“协同治理”发展阶段	63
第一节 系统维护:社会管理初步探索	63
第二节 系统转换: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并重	67
第三节 系统改良:社会管理创新试点	73

第四节	系统升级: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	77
第四章	多元参与:宁波“协同治理”主体培育	86
第一节	多元主体和多维社会参与	86
第二节	党建引领:作为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的党组织	94
第三节	资源下沉:打造坚强有力的基层政府	109
第四节	激发活力:社会组织的多重培育机制	127
第五节	政商合作:推动企业参与社会治理	137
第五章	系统整合:宁波“协同治理”体系建构	153
第一节	治理体系与系统整合的三种机制	153
第二节	权责机制:以街道体制改革促进组织间协作	158
第三节	联动机制:以网格化建设搭建治理网络	162
第四节	共享机制:以信息化建设推动整体型政府	174
第六章	透明开放:宁波“协同治理”方式创新	185
第一节	社会治理方式的现代化	185
第二节	从封闭性到透明化的社会治理	192
第三节	从人治到法治的社会治理	199
第四节	从命令式到协商化的社会治理	209
第五节	从政府包办到社会化的公共服务供给	222
第七章	初步评估:宁波“协同治理”成效检验	229
第一节	指标设计:社会治理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	229
第二节	数据收集:社会治理评估的方法和过程	243
第三节	数据分析:社会治理评估的结果	247
第四节	宁波社会治理的成效	252

第八章 未来展望:宁波社会治理创新的模式与发展趋向	259
第一节 宁波社会治理创新的模式	259
第二节 宁波社会治理创新的经验	263
第三节 宁波社会治理创新的原则	268
第四节 宁波社会治理创新的未来	271
结语:社会治理的中国经验	278
附录一:案例目录	287
附录二:宁波社会治理经验名词解释	289
后 记	292

导 论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社会服务、社会参与、社会归属、社会秩序、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等方面的需求日益迫切,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适时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现代国家建设除了要完成经济发展的任务之外,还必须完成社会治理的任务,经济发展体现了国家的生产能力,社会治理体现了国家的控制能力。因此,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是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

宁波属于沿海开放城市,民营经济发达,经济发展水平已经比肩世界中等发达国家,基本实现了现代化。宁波要继续走在全国前列,必须要在社会治理创新上有所突破。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宁波紧随时代脉搏而动,深入进行协同治理探索,走在了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的前沿,掀开了协同治理的新篇章。宁波在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充分运用社会力量、市场力量和科技力量,调动和激发每一个参与主体的积极性,打造利益与责任统一的命运共同体,形成了公共事务公共治理,共担社会责任,共建美好家园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本书以宁波社会治理创新为案例,系统总结宁波社会治理发展的过程,并从治理主体、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三个方面总结宁波社会治理创新的经验。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宁波进行了一些探索和创新,以宁波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作为突出案例,来分析中国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既具有典

型性,又具有引导性,因为宁波社会治理过程中面临的许多问题,也是一些城市正面临的或者将很快遇到的。因此,深入分析和研究宁波探索创新社会治理的路径与方法,不仅对于宁波深入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其他地区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借鉴意义。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任务

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个“中国梦”被解释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设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提出具体时间表:“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决定》把“全面深化改革”落实在现代“国家治理”的制度层面,希望通过15大领域的60项具体改革,逐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种新的表述被人们概括为“国家治理现代化”。201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又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201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2016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从“中国梦”到“国家治理现代化”再到“依法治国”、五大发展理念和“从严治党”,就内在逻辑而言,这些不同提法反映了从理想目标向制度载体再到操作实践的演进过程。考察中国共产党施政口号的变化,可以认为:在中国经济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关键,已经从经济建设层面转向政治和社会建设层面,具体而言就是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按照现代国家理论以及政治发展理论,“国家治理现代化”应该体现以下四个方面的任务:通过市场化改革,理顺政府与企业关系,确立企业的

主体地位;通过民主化建设,理顺政府与公民关系,确立公民的主体地位;通过社会化建设,理顺政府与社会关系,确立社会的主体地位;通过法治化改革,理顺人治与法治关系,确立法律的主体地位。

(一) 市场化改革:理顺政府与企业关系,确立市场主体地位

市场化改革是中国在向现代化迈进过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但那个时候,人们并没有意识到经济改革要以市场化为导向。1992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大明确了市场化的目标,确定到2010年完成市场化进程。这也就是说,中国要用大约30年时间完成对计划经济的市场化改造。根据实际状况来看,前20年主要在于构建市场经济体系,后10年在于完善市场经济体系。现在,中国初步建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加入WTO这一事实表明,市场化这道门槛就要被跨过去了。

我国市场化改革也面临着许多困境,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主要是由于体制性的障碍导致出现了内部失衡与外部失衡的局面。这些障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各级政府依然掌握着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例如信贷资源,因为银行体系、金融体系改革没有到位,所以各级政府依然对于信贷的发放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还有土地资源,因为土地的产权不明确,依然由各级政府自由裁量运用。1992年的中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在确定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时就已经明确,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在资源配置中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就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价格起作用,因为这种价格是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但是现在一些重要资源不是由市场而是由政府配置的。

第二,把GDP的增长作为各级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志,不光在党政机关考核干部时如此,社会舆论也是如此。这种观念从政府体系产生,并不断蔓延至社会的各个单位,由表及里地对社会各个领域产生激励,并使得一切与之冲突的激励机制趋于失效。

第三,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和物质生产增长紧密相连,从收支两方面看都是如此。从财政收入看,各级预算的主要收入是生产型的增值税,生产型的增

值税跟物质生产部门的速度是直接挂钩的,所以使得各级政府不得不把主要注意力放在物质生产部门的扩张上。

第四,资源配置上市场的力量受到很大的压制。这表现在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没有市场化,而是由行政机关定价或者受行政机关的影响,而行政定价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惯例压低价格,因为要素价格压低有利于国有企业降低成本和增加盈利,而价格的扭曲导致了生产过程中的资源浪费。

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比较关键的是要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全会《决定》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发挥更好的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或监管不到位问题。”^①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各级政府必须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开展工作,创新执法体制,完善执法程序,推进综合执法,严格执法责任,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依法行政体制,加快建设职能科学、职责法定、执法严明、公正公开、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为此,必须重视和探讨如下问题:第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主要探讨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和政府要发挥的作用。第二,简政放权与政府能力,主要探讨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之间的关系。第三,我国当前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方案。第四,我国当前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政府职能转变涉及政府管理的范围和政府的能力问题。弗兰西斯·福山在《国家构建》一书中指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政治改革中走向了国家秩序混乱和经济衰退的局面主要就是因为是在缩小政府职能范围的同时,政府的能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6页。

力也削弱了,国家构建就是要在缩小政府职能的同时,增强政府力量的强度。尽管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历史和发展情况,但是,人类社会发展也有某些共同的规律,否则社会科学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以其他国家的发展作为镜子,可以让我们在发展过程当中少走弯路。发展中国家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在政治发展过程中,陷入了混乱,亨廷顿认为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治参与要求超过了政治制度化的水平,而用福山关于国家治理能力的概念来说,这些国家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在缩减政府职能的过程中,也削弱了政府的能力。当前,我们国家新一轮的政府改革强调要转变政府职能,让市场和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一改革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改革过程当中,我们也要在缩小政府职能的同时,增加政府的治理能力。

(二) 民主化建设:理顺政府与公民关系,确立公民主体地位

现代国家构建首要是提高国家的治理能力,维护国家的秩序和稳定,尽管在国家构建的初期,国家能力和民主建设之间可能存在不一致,但是,从长远来看,稳定的民主政治是国家能力的基础。今天,民主已经成为国家和政府获得政治合法性的最主要来源,民主的深入推进,影响到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

第一,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国共产党自建立的那天起,民主就是其一个重要的奋斗目标。1947,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其兴也浚焉,其亡也忽焉”,称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率。毛泽东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①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②十七大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指出:“人民民主是我们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

^① 黄炎培:《八十年来附〈延安归来〉》,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年版,第156—157页。

^②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